

公共性语境下的师德建设方略

江 虹

[摘 要]师德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共同视角对传统师德的现代困境进行分析,揭示出现代社会师德的公共性特征,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现代师德建设的相关建议。现代社会中的师德建设要以尊重教师职业权利为起点,保持师德评价系统的独立性,以公共准则为师德测评标准,以法律和道德双重机制促进师德建设,加强师德评价的公共参与。

[关键词]师德建设; 师德评价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16)10-0068-06

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高尚的师德是教师从事教育事业的核心素养之一,师德建设是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工程。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师范大学时作了重要讲话,倡导全国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1]。事实上,师德建设一直是国家、教育部门重点建设项目,继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提高师德水平”之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新时期,教师发展呈现出科学化、专业化和复杂性特点。如何加强新时期师德建设,是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本文从公共视角出发,着重研究和探索师德建设问题及其重点建议。

一、传统师德的现代困境

传统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尊师重教的优良

传统源远流长,人们向来对教师群体抱有相当高的道德期望。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教师队伍不时有道德失范事件出现,给教师队伍、学校甚至整个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规划新时期师德建设方略,首先要厘清师德内涵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概括地说,传统文化视域中的师德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师德标准高于一般社会职业道德。在传统文化中,教师具有比一般社会从业者更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学校教育的特殊作用有直接关系。中国的传统观念将学校视为政府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工具,认为圣贤的君主建立国家和治理人民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学校教育,如儒家经典提出:“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学记》也有“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等相关记载。在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国君和教师成了统治人民的关键性人物。荀子提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荀子·礼论篇》),认

江 虹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博士生 100048

为没有国君和教师,就不可能对一个国家进行统治。因此,被传统文化浸润的中国历史上长期流传着“天、地、君、亲、师”的说法,教师被当作君主统治的助手,而学生则处于必须绝对服从国君和教师的地位。这样,人们对教师的道德要求难免要与“天地君亲”等同,教师要比一般社会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更高。

其二,将教师的“为人之德”与“从业之德”混为一谈。在“人治”“德治”意味浓重的传统思想观念中,人们对教师的重要作用有充分认识,认为“教”的意义在于“上所施,下所效”,因此将受教育者德才兼备的希望大部分寄予教师,认为教师应以个人生活中的“为人之德”和教学生活中的“从业之德”全方位“为人师表”,这一观念从《论语·泰伯第八》中可见一斑:“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在崇尚德治过于法治的传统社会,相比学识,教师的德行能对学生起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的表率作用,所以尤为重要。这种思想观念使人们在考察教师的从业资质时,往往将德行作为第一考量要素,将具备较高的德行设为教师从业的标准,从而混淆了教师“为人之德”与“从业之德”的界限,二者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德行而无须甄别。

其三,以伦理标准衡量师德。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共同体社会,人们以伦理纲常而非法律来作为衡量师德的标准,原因在于儒家“人治”思想对国人的影响远高于“法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伦理就扮演了宗教的角色,成为衡量师德的标准。而伦理道德的主要特点有两个:第一,伦理是约定俗成的。按照伦理标准,人因天命不同而被分为尊卑有别的不同等级,虽然同为人,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须遵从不同的道德标准,缺乏公共性、统一性。教师属于“圣贤”层级,德行要求相对较高。第二,伦理标准具有随意性。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是自然分工,因此人的生活角色也是自然性赋予,每一种角色都代表一种特殊身份,每一种都是特殊关系,每一种交往关系都是独特的和无法复制与普及的,交往的道德准则也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公共的统一

标准。以伦理标准衡量师德,常因人、事的不同而各异,情境性比较强而界限不明,很难有统一评判的考核标准。

随着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以法治化、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逐步建立起来,中国逐步由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许多传统在现代遭到解构,师德内涵的几个决定性要素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变为法律面前的平等关系;公共教育制度逐步建立,人人享有受教育权。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师德的内涵进行重新阐释,重新解读师德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师德仍具特殊性吗?其次,将教师的“为人之德”与“从业之德”一同列为教师从业的硬性德行指标是否合宜?该如何制定出合宜的师德标准来促进师德建设?要回答以上问题,核心工作是要将时代赋予师德的新特性发掘出来。

二、现代社会师德的公共性特征

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体系,师德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伦理结构与秩序的反映。在新时期,现代国家赋予师德公共性内涵。公共性是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属性,其含义是指“共有”或“共用”,与“个体性”“私人性”相对应。现代国家以民主和法制为主要特征,确定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促使社会大众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社会公共化程度不断提高。民主与法治赋予所有行业的从业者平等职业身份,而师德是关于教师职业身份的道德规定,因此也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获得了公共性。师德的公共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教师身份的公共性

1. 作为公民的教师:具有政治意义上的平等身份

现代国家以法制为基础,“以政治信念确立了个人的地位,并为个人赋予了一种作为社会的一员的某些先决资格”^[2],教师首先是“公民”而不是“圣民”,国家法律规定了教师首先是作为一个公民而存在的,这是教师的第一个公共身份。“公民”是具有公共性的身份,不具排他性和特殊性,公民

身份解构了教师从伦理纲常的人身依附关系中所获得的圣贤身份,而使其首先获得了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平等身份,与其他公民一样,认同并一致遵守法律所规定的公共法则。

传统社会将教师职业身份圣贤化了,教师被赋予一种超越所在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圣人”“君子”的神圣色彩,被建构为一种上层阶级的“精英”。于是,师德被解读为一种“圣贤”道德和一种“尽善尽美”的“美德”。美德是人类道德的“理想”而不是“现实”,它无法等量化要求每位教师,因此不具有普遍推广的可能性,只能高居于道德楷模的宝座之上,成为一种虚无缥缈的道德理想,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不具公共性。

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使教师的职业身份从“圣贤”的地位还原为普通“公民”,也将师德从一种“圣贤美德”转变为法律面前的普通教师职业道德。从道德的角度,现代国家的每一个体都平等地承担道德责任和义务,同时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因此,包括教师在内的每个人都应将他人视为与自身具有平等道德权利的个体,在向对方施以道德义务的同时获得对等的道德权利。师德不再作为一种高贵的“显贵道德”或常人不可及的“美德”存在,而表现为一种为全体公民无差别地共同遵守的道德。道德不再属于少数圣人和精英阶层,具备了能够普遍化和人人都可遵守的可能性,成为人人可欲求的公共道德。

2. 作为职员的教师:具有行政意义上的公共身份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国家的公共事务,现代教育制度赋予教师具有公共性的“职员”身份。可以说,是现代教育制度将教师的传统“官员”身份还原为普通学校职员,享有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同样平等的社会地位。

从制度形式上看,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始终的是“政教合一”“官师一体”的体制。“在制度和文化演进中树立起来的历史霸权意识,赋予了教师某种确定的、极权化的身份。”^[3]传统封建制度中,教师身份乃是具有浓重阶级倾向的“士”阶层,是“统

治之道”的体现者和道德教化的实施者。他们上为统治阶级培养“治国、平天下”的统治人才,下对百姓进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教化以培养“顺民”“臣民”,以此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而师德则是“教师之德”“官员之德”“仕人之德”的混合体。^[4]

随着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完善,学校管理制度去行政化,“官”“师”逐渐分离,传统教师的官员身份逐渐消解,教师聘任与国家公务人员录用开始各自采用不同的系统。教师的身份是学校的职员,服务对象是学校,按照学校的安排统一规划各项教学活动。学校或教育系统按照其职员身份,统一规定、设立教师职业道德标准,组织统一、公开的学习,以统一道德标准要求教师。如此,师德在当下的教育实践中表现为一种普遍的、可复制的、公平的道德准则,而这种公平性、公正性是师德公共性重要表现。

(二) 教师职业精神的公共性

1. 教师职业蕴含契约精神

在现代国家,教师职业蕴含着具有公共性的契约精神,即它首先关注和规定的是教师公共职业而非其个人性的情感表现。从现代师生关系的建立方式的角度看,受教育权是国际公认的人权,政府用税款办教育,教师被聘请来参与人们教育权利的行使,学校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这种形式可以视为一种契约。既如此,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专业人员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就如同医生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协助一样,教师的工作是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个人道德跟工作责任不应当混淆。教师要按照契约精神来提供学校规定的教育服务,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一个学生有缺点又无法改变,教师即便在情感上不接纳,但依然要按教师专业的要求努力为其提供教育。也就是说,教师职业必须首先体现为与教师职业角色而非其个人情感等因素所关联的专业方面的造诣,如知识水平、职业能力和职业责任,而非其个人生活旨趣、情感偏好等,这是古今教师职业最显著的區別。在学校的教育实践中,教师职业水平的高下不

是以私人生活、个人品行和公共职业双重“完美”标准进行要求,而是要履行契约,将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工作职责作为道德实践的第一要务。

2. 教师“从业之德”标准的公共性

在现代国家,各种不同职业的建立基础是知识的分工与系统化,因此,不同职业之间的区分既是精细的又是各具逻辑的,都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教师职业道德的参照标准乃是通过公共方式特别制定的。首先,国家设立师范类院校,对师范生统一进行基本道德教育,教师从业之前即习得教师行业的统一道德要求;其次,教师资质的考核、授予,教师身份的确认等均由教育部或教育公共组织参照国家统一的公共标准来施行;再次,在教师的道德实践中,所有主体之间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即学生、学校乃至全体社会成员均要尊重教师作为一名教育从业者的道德权利,也有权对其道德行为进行监督。

(三) 教师职业价值的公共性

1. 教师职业的公共价值

从教师自身职业的角度来看,教师通过自身劳动促进全社会的公共福祉,其职业实践与现代教育的公共价值追求是一致的。现代教育具有传播公共精神、培育公民公共理性、促进人类共同体幸福、和谐及安宁的本源性价值和独特性使命,因此,在现代国家,教育是国家的公共事务,与国家密切相关。尤其以公共教育为代表的现代教育制度,是国家产生以后为追求正义价值和公共利益而建立的教育制度,是现代国家履行教育职能的制度设计形式。现代教育制度体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如正义、公共性),在法律层面体现出对全体社会成员教育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在价值目标上体现出对正义、公共性的坚守。作为现代教育的主体之一,教师身份是公共知识的研究者和传递者,其职业具有公共价值。

2. 师德实践的公共性

为现代国家培养“公民”是教师职业价值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培养公民即是对“公民在共同生活中共享的、在理性上共同认可的价值”的传扬和

坚守,是教师利用自身的教育优势,以公共利益为指向,服务社会,拓展全社会公共福祉的实践活动。^[5]通过一系列的道德实践塑造受教育者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受教育者的公共价值观逐渐被塑造起来,受教育者作为公民的公共生活实践逐步完善,受教育者的公共生活品质得到提升、公共精神得到培育。教师通过知识文化的传递与再生,服务人类共同体公共之善、引领社会文化价值方向,形成公共理性。^[6]所以说,师德实践具有公共性。

三、公共性视域下的师德建设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障碍之一,就是社会转型致使教师职业道德标准的制定与评判一直处于欠缺成熟和稳定的境况之中。“社会转型期形同于社会‘失范’期……社会相对地处于缺少一个统一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标准的‘真空期’和价值多元期”^[7],传统与现代的此消彼长将人们抛在一个多元价值观念、行为标准冲突交织的多元世界当中,思想观念的变化带来一系列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和混乱,师德所引以为据的价值参照系统也遭到解构。从公共性视角反思师德建设,以平等、公正的手段建构教师职业道德的内涵、评价标准、约束机制等,以此促进教师职业道德实践。

(一) 尊重教师职业权利,保持师德评价系统的独立性

教育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教师作为教育主体之一,其职业具有特殊性,因此,应当以对教师职业权利的尊重为起点,保持师德评价系统自身独立性,不以教师身份之外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师德,给师德正确定位。

由于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加之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社会舆论习惯性地以“完人”标准衡量师德,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定位仍然比较高。一篇网络转发量非常高的文章《只有老师是优雅的,我们的孩子才有望优雅》里这样说:“所有职业中,‘教师’必须保有不同于其他职业的绝对高贵性。只有那样,师者,才能获得尊严。教育,这件纯粹作用于心灵的事,也才会像宗教仪式般纯净而有神

的光芒笼罩……千百年来,老师的意义非凡,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就是老师给我们的心灵回响。老师传授的知识,或许我们会忘记,老师讲解的道理,或许我们会不再认同,但老师的为人与处事,老师的期望与鼓励,老师面对生活的态度,却像无形的风吹进我们心里,带来一种永恒的影响。”^[8]可见,在时代变迁、精神家园失落的现代社会,教师职业背负的期望与遭受的非议都是过重的,这给教师职业戴上了道德枷锁。

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是在正确的教育理念的引导下,帮助学生掌握各学科知识和具备学习能力,引导学生成长为“最好的自己”,能够融入现代生活并成为国家的建设者。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态度、方法和学识等因素同样重要,不能以人之德作为衡量教师是否专业的硬性指标,这是对教师职业权利的尊重。因为“在社会、国家为民众争取美好生活的时候,基本权利是一个不能以任何其他善的目标来挤兑的前提性价值。其他一切善的价值都要在尊重、保卫基本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去努力争取”^[9]。师德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不以“完人道德”绑架教师,从而给教师道德实践减压。

(二) 为师德评价设立公共准则

《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引领、保障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这意味着法治在教育领域的贯彻。现代国家解构了师德的神圣光环,师德不再具有特殊性,而成为一种具有鲜明公共性的公共道德,师德特殊性消解而普遍性确立。如此一来,传统师德观无法再延续其约束作用,约定俗成的伦理纲常已不适宜用来作为评价师德的参照系,应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共准则取而代之。

1. 完善教师职业道德统一标准

到目前为止,教育部相继制定并发布《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作为所有教师要遵循的总体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教师职业道德的评断依据。然而,不同学科、专业、学段的教师对于同样的道德规范必然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上述道德规范还需进一步细化为不同学科、专业、学段的统一标准,才能更加具

有操作价值和规范价值。美国在师德建设方面的先例值得参考。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发教师教育专业标准的国家,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不但制定了《教师教育机构鉴定的专业标准》,提出教师教育的总体标准,还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教育学段,如小学教育、初等教育、特殊教育、环境教育,以及不同学科,如数学、科学、社会科、体育等,与各专业协会合作,制定体现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学段教师教育特点的具体标准,使教师职业道德的评价更加细致、专业、统一,更加有利于引导教师自身职业道德定位,从而使师德建设有章可循。

2. 法理约束和道德激励相结合

师德建设需要法律的约束,即从法律层面对教师基本的从业准则进行硬性规定,即所有教师,无论个人的道德修养高尚与否,都必须接受一种作为最低要求来坚守的道德义务,一种为大家所承认的共识,包括“扬善抑恶、诚信友爱”等一般社会道德和诸如“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等一般职业道德所共有的特征;同时,由于师德是关乎教师心灵的品德建设,也应从道德层面鼓励教师将“完人道德”作为个人职业修养的终极目标。学校以及社会各相关部门也应当以人为本,关怀教师的生活,为教师道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激励教师从内心生发出提升职业道德的美好愿望。

以法律法规方式制定师德标准并非忽视教师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性,而是重新调整了师德评价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师德建设需要法理规约与伦理激励相结合。一方面,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或认可的法律来约束或制裁教师的严重失德的行为;另一方面,借助社会舆论、社会教育来培养教师的道德情感,通过道德谴责来惩罚道德失范行为。

(三) 加强师德评价的公共参与

1. 促进家长、学生和社会参与师德建设

在我国当前的师德评价体系中,主要的评价主体是学校的管理者,主体较为单一,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这并不有利于师德建设的公共性,公共性的一个含义就是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因而要采取相关措施,使得师德建设的相关主体积极参与到师德

评价中来。当前情况下,师德评价的主要相关主体是家长、学生和社会,因而要采取相关措施,完善相关制度,使得家长、学生和社会能够参与到师德评价中来,使得师德评价的主体多元化,从而保证师德评价的有效性,形成师德评价的立体网络。

2. 引进公共舆论监督师德建设

由于师德建设涉及社会的重大利益,社会中某一教师的道德失范事件往往会引起社会的重大关切,这些关切对于师德建设有着重大的影响,公共舆论对于师德建设有着重要作用,这也是师德建设公共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在师德建设方面,需要高度重视公共舆论的作用,需要积极引进公共舆论对师德建设进行监督。既需要引进公共舆论加强师德建设,也需要对公共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引导公共舆论从公共性的角度客观地看待师德建设,而不是偏颇或者对师德建设加以误导,需要发挥公共舆论的正面作用,联合多种媒体集中宣传优秀教师先进事迹,努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而在当代社会,公共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网络,网络舆论在当代社会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而需要积极发挥网络的作用,特别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作用,促进网络舆论在师德建设中的作用发挥。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于公于私所持的价值观。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好老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并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10]可见,作为各项教育活动的灵魂人物,教师对受教育者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不言自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教育是什么》中表达了他对教育的独到理解,即“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无论何种形式的教育,都内含着身教重于言教的因素,师德出现问题,不仅影响到整个教师队伍的形象,影响到学校、教育

系统的声誉,也影响受教育者对教师的信任,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但当前形势复杂,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应当从教师队伍开始,做好立德树人的建设工作。有学者指出:“立德树人事关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全局,将为提高全体公民道德素质提供有力支撑,已成为教育系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因此需要全面融入宏观教育政策的实施范畴。”^[11]立德树人的目标要落实到育人者——教师的工作中,需要的是一种面对现实、深入实际、尊重实践的态度。公共性提供了一个透析现代师德的全新视角,使师德建设有了新的着眼点,并能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

但需要言明的一点是,职业道德问题是很难用法律、法规来监管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乃是不断提高教师的自我道德约束。因此,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不仅仅表现为行政部门制定的具体条文和规章制度,更包含着一种价值的引导和内化。尤其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教师职业道德的公共性需要被充分、深刻地认识,并转化为教师内在的精神诉求和外在的行为导向,从而使教师的职业生活更具公共情怀和公共追求。

[注释]

- [1][10] 习近平.习近平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全文)[EB/OL].(2014-09-10).<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10/c70731-25629093.html>.
- [2][9] 詹世友.公义与公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42.
- [3] 孙玲.教师身份的历史变迁——变革中的深层反思[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1).
- [4] 肖群忠.传统师德及其现代价值[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9).
- [5][6] 金生鉉.公共价值教育何以必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 [7] 熊明,刘晖.社会转型期的教育价值取向[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7,(2).
- [8] 徐海蛟.只有老师是优雅的,我们的孩子才有望优雅[EB/OL].<http://www.trxw.gov.cn/2015/0922/71794.shtml>.
- [11] 张力.纵论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任务[J].人民教育,2013,(1).

(责任编辑:张 蕾)